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读懂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

张占斌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且不确定性空前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安全范式面临严峻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工作基调，强调“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定向领航。这些重要指向意味着要把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这不仅有利于应对短期冲击，更是确保中长期繁荣稳定、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赢得主动的必然选择。

为何将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

经济韧性，指的是一国经济系统在遭受外部冲击（如金融危机、供应链中断、地缘冲突、自然灾害）或内部结构性压力时，能够有效抵御、快速适应并在冲击后实现恢复甚至转型升级的能力。它集中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抗压性、恢复力、适应性。将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这源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与大国博弈的长期化。当前正处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过去基于效率优先、成本优化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正让位于区域化、本土化布局。大国间科技竞争、关键物资的竞争，进一步凸显了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极端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意味着要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命脉不被“卡脖子”，这正是经济韧性的重要内涵。现有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挑战，贸易壁垒、技术封锁、金融制裁等成为博弈工具。增强经济韧性也意味着我们要有能力在外部环境恶化时，维持国内经济的基本盘稳定，并具备制定新规则、开辟新市场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的边界日益模糊，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捆绑。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已成为经济决策中不可或缺的考量。

这亦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更为复杂。增强经济韧性，有助于减轻转型期的阵痛，防范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必须”，其中“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正是增强韧性、跨越发展关口的重要指引。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角度看，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增强经济韧性，必须着力突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核心种源等领域“卡脖子”技术，将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与“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部

署一脉相承，通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筑牢科技发展支撑。从应对人口结构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等长期结构性矛盾，要求经济体系必须具备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和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双碳’引领”的一系列部署，为应对这些慢变量挑战提供了路径，本质上是持续增强经济系统的自适应能力。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重要议题来看，无论是侧重于稳增长、调结构，还是强调“六稳”“六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抑或是此次明确“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核心逻辑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强身健体，增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内生韧性。近期，世界银行等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中国外贸市场更加多元化，为保持经济韧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经济的固有优势与底气所在

中国经济之所以具备抵御风险、逆势突围的能力，根源在于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厚优势，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这些优势不仅是韧性建设的坚实基础，也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实施路径高度契合，构成了大国博弈的坚实底气。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内需韧性的坚实根基。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持续的消费需求，从基本民生消费到高品质消费、从传统实物消费到新型服务消费，市场层次丰富，需求多元。这种规模效应不仅能较好消化国内产能、支撑产业升级，更能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发挥缓冲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等举措，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让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经济循环的“稳定器”，即使面对贸易摩擦或全球需求萎缩，国内市场仍能为企业提供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同时，超大规模市场能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聚集，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赋能，进一步强化抗冲击能力。

完整产业链优势，是供应链韧性的核心支撑。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各产业门类相互配套、协同发力，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抵御局部环节冲击。这种完整性意味着，即使部分核心零部件暂时受限，国内产业仍能通过替代方案、技术攻关维持基本运转。中央提出“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正是基于这一优势的战略延伸，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让完整产业体系在创新转化中持续升级，为供应链韧性注入持久动力。

创新动能强劲优势，是科技韧性的动力来源。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创新投入持续加大，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达到2.68%，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突破，形成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这一发展态势与中央关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部署形成呼应。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50万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富有韧性的创新格局正在形成，有效增强了应对外部技术制约，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替代的能力。

显著制度优势，是治理韧性的系统保障。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这在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和有力彰显。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我们快速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全球能源粮食价格波动，通过综合施策、精准调控确保国内市场平稳运行。这些都是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聚焦当下，无论是强调“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还是关于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部署，都指向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制度优势，确保经济系统在冲击面前快速响应、协同应对，展现强大治理韧性。

扩大开放合作优势，是经济韧性的全球延伸。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形成更加紧密的跨国经贸合作网络，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落实好“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等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促的开放新格局。这使我国能够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中把握主动，既为自身韧性建设注入外部动力，也为全球经济韧性贡献中国力量。

经济韧性的多重要义与构建路径

增强经济韧性是系统工程，涉及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需在现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补短板、锻长板、固底板，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筑牢物质基础。

瞄准构建自主安全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既要巩固轨道交通、电力装备等优势产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又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中突破高端芯片、

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同时，优化产业链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畅通国内产业循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多元布局，建设有韧性的全球生产网络；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塑造长远竞争新优势。

增强科技创新韧性以激活内生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攻关合力。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激励研发投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创新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畅通要素流动，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动实数融合，以智能化、数字化驱动产业升级，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韧性。

增强内需韧性以强化循环支撑。关键在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与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求更好衔接，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同时拓展有效投资，聚焦创新发展、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增强能源资源韧性以保障运行安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在发挥煤炭等传统能源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时，加快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更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优化储备结构和布局，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落实“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要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关键资源对外依赖度，为安全发展提供保障。

增强制度韧性以提升治理效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最大限度聚集和调动发展资源、有力抵御风险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对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转变和优化，更是一种新的发展导向，是对过去的投资模式、产能扩张模式乃至发展模式的校正和完善。必须明确，两者并非彼此割裂或相互替代。在实践中，既要避免“见物不见人”的旧路，也要防止“见人不见物”的偏颇，要从内在统一和互补共生的角度把握其辩证关系，实现“物”的承载与“人”的发展的紧密结合和良性循环。

从发展目标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入，重点指向支撑生产运行的物质载体建设，涵盖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也包括技术研发、数字设施、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积累。投资于物不是单纯为了追求物质积累、经济增长等，也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促进人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是面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战略性投入，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使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投资载体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都需要投资物质载体。虽然投资于人是对人的能力提升进行投入，但这些投入也需要通过投资于具体物质载体来承载。例如，教育投资一般包括教育经常费用（如教职工工资）和教育基本建设费用（如校舍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等部分。其中，校舍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都是具体“物”的投资，且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于物主要是直接投资实物资产载体，但也包含投资于人的因素。例如，对新型基础设施等“物”的投资，可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为民生改善提供支撑，同时这也需要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才培养作为保障，也就是说需要相应加强对教育、技能培训等“人”的投资。

从发展动力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一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强调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既离不开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必须有高质量的人才资源作为支撑，二者在目标上高度统一、相辅相成。这体现到经济发展和投资布局上，就要把握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投资于物”，加大对各类劳动资料和工具的投资，改善生产方式和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发掘更多可用于拓展的“劳动对象”，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资本；另一方面更需要“投资于人”，切实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大力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还要看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具有发展过程上的接续性和功能系统上的互补性。从发展过程来看，过去我国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拉动，通过大规模物质资本积累形成了显著的规模效应，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人的素质能力就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激发内需潜力、培育新增长动能的关键力量。从功能上来看，投资于物，重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供给能力，强化发展的“硬支撑”；投资于人，则重在增强劳动者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需求侧的有效动力。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高效协同，可以使生产端的高质量供给和消费端的高水平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既在统一，又具备统筹推进的现实基础和制度条件。投资于物为发展奠定基础条件，也为人的能力提升与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支撑；投资于人则为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使物质资本投入更有效率，推动生产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坚持二者紧密结合，既是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布局，也是关键的工作方法，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当前和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科学指导。

面对人口结构重大变化、生活方式加快转型、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起来考虑，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方向，推动“物”的投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中，形成支撑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人的创新创造提供广阔舞台；又要优化人力资本投入结构，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更多资源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人力支撑；还要强化政策统筹衔接，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将人力资本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综合评估制度，把教育培训、技能提升、就业吸纳和民生改善等纳入绩效考核，为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科学理解“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徐建伟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保持其比重，关键要在“合理”二字上下功夫。这意味着既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更不能放松懈怠导致“过低”的比重，而要坚持动态跟踪、协同部署，实现制造业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机结合。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的重点所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制造业占比上升的过程，部分国家曾经达到35%左右的峰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比重也保持在较高水平。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工业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制造业作为增长引擎和发展支撑的地位依然非常突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对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至关重要。

放眼全球，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是有惨痛教训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经历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法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制造业占比在20%至23%之间，到2024年仅有9.4%，英国从1990年的16.5%降至2024年的8.0%，德国从1991年的24.6%降至2024年的17.8%。“去工业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导致经济增长动能下降、劳动就业问题严重甚至危及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推动重振制造业或再工业化，也是对既往工业化路径的反思和调整。我国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决不能走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规模衰退、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

的老路子，而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进一步看，制造业比重亦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变化的综合展现。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其比较优势减退，制造业投资减少、竞争力下降。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竞争优势集中在少数高精尖行业，纺织、服装、原材料等多数行业因缺乏竞争优势而大面积衰退，重振制造业缺乏足够的基础支撑。发达国家处于产业链头部的跨国企业技术水平高，综合实力强，但加工组装、零部件生产、材料供应等环节的配套协作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导致整零关系失调、增长带动效应不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要有链主领军企业的引领，也要有零部件配套企业的支撑，还要有平台企业的衔接，防止企业在梯度上出现明显断层。

如，处理好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企业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构成。独木不成林。发达国家处于产业链头部的跨国企业技术水平高，综合实力强，但加工组装、零部件生产、材料供应等环节的配套协作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导致整零关系失调、增长带动效应不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要有链主领军企业的引领，也要有零部件配套企业的支撑，还要有平台企业的衔接，防止企业在梯度上出现明显断层。

如，处理好不同区域产业耦合发展的问题。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也是各地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禀赋差异较大、发展水平不同，为各类产业发展提供了多种支撑条件和空间选择。应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形成错位互补、耦合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

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比重变化亦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能以僵化的眼光看待具体比重，而要跟踪发展态势，不断调整主攻方向，找准发展的战略支点。

形成协调的产业结构是关键。制造业发展既不能喜新厌旧、忽视传统产业改造，也不能止步不前、急于新兴产业培育。对于传统产业来说，核心是聚焦要素投入粗放、效率提升缓慢、增值溢价不高等问题，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说，核心是聚焦要素投入粗放、效率提升缓慢、增值溢价不高等问题，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说，核心是聚焦要素投入粗放、效率提升缓慢、增值溢价不高等问题，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

说，核心是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推动更多新兴产业壮大成为支柱产业，在全球产业格局重塑中占据先机。

加大转型发展投入是前提。我国已建成230多家卓越智能工厂，工厂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28.4%，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2.3%。制造业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转型投入增长机制，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扩大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使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生产要素提质升级同样需要重视，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推动传统技术工艺向先进技术和新型工艺转变，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构建梯度完整的企业队伍是基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需要在链主领军企业、零部件配套企业和平台企业上保持相对合理的比例关系。要按照国内根植性强、技术水平高、上下游带动作用突出的标准，分行业分领域培育一批科技型融合型链主企业，补齐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增值服务等短板。同时，增强专精特新企业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和配套能力，深化大中小企业间的技术、产品和市场关联。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支撑。我国产业梯度布局提供了纵深空间。东部沿海地区要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人才资本等优势，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能力和未来前沿技术创新策源能力，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建设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则要更好发挥资源能源优势，聚焦能源材料、基础零部件等优势特色领域，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产业新增长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编 夏祎
来稿邮箱 jjrbll@sina.com